

漫漫求学路——纪念中国恢复高考40年

本报特约撰稿人：珞珞

(本文<三>见2017年12月8日第B4版)

(四) 学无涯

73年考大学风波刚刚落下帷幕，厂技术科科长邹师傅就找我，要把我调到技术科工作。我的化学分析工作刚刚入门，不想半途而废。离开化学实验室这块净土到科室，离人群近了，离政治近了，离危险也就近了，难免会有新的冲突。邹师傅找我几次，承诺到科室后会给我学习提高的机会。我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实验室。

厂部由两个院子组成。北院是政工院，是工厂的政治漩涡中心，党委宣传科、共青团、工会和武装部等都在北院。武装干事的办公室里晚上经常亮着灯，里面不时传出女牌友们的笑声。工会办公室里只有干事常红兵。他掌控着工厂广播站，那是党的喉舌。

南院大一些，除了厂长、书记和厂部办公室以外，集中了和生产有关的各科室，包括财务科、供销科、生产科和座落在东南角的技术科。技术科门旁一棵石榴树展开浓绿的叶子，几乎把后面的窗户都遮掩了。每年春天树上开满艳丽的石榴花，红红火火。

工厂原来技术力量差，设备图纸资料严重缺失。邹师傅是从工人提拔的技术科长。后来到厂里的两个技术人员，一个是西安交大机械系毕业的宋辛捷，一个是哈军工无线电专业的郑宾永。他们分管机械和电器设备。我的任务是描图、绘图、晒图、全厂设备图纸管理，以及外协工作。

描图绘图需要经验和技巧，但是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要把工程师、技术员的设计或者他们现场测绘的设备数据用手工的方式画成标准图纸，用描图纸描好，再晒成蓝图。初中的几何知识派上了用场，不久描图绘图已是得心应手。我身后空荡荡的档案柜很快被填满了，图纸都分类编号归了档。我和技术科的师傅们都熟悉了，技术科的斗室又成了浑浊世界里石榴树后的一片绿洲。

为了彻底改变命运，实现医生梦，我奋力抗争了一次。即便失败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尽力了。化学分析的工作半途中止，但是学到的经验已经是我人生财富的一部分。手工绘图描图的工作帮我了解机械零件和机械结构，管理起全厂的设备资料。在科室跑腿，出差、搞外协帮助我和各个车间建立了联系，和北京建材研究所建立了联系，提高了沟通能力和办事效率。

一天，办公室里只有郑师傅和我。他给我讲了文革中他随装甲兵学院搬迁到甘肃酒泉的经历。院校搬到沙漠地带，在

清理营盘时，推土机推出无数干尸。后来知道那里原来是右派劳改农场。三年大饥荒时很多右派在那里饿死了，就草草埋在黄沙里。郑师傅平静地叙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但是我的心被狠狠戳打着，痛着，再沉下去蒙上一层死灰。多年后夹边沟的事情被写成了书。我不知道郑师傅去的地方是不是夹边沟。文革乱世中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公，但到底我们还活着。我感到活着就有希望。

郑师傅建议我不要停留在科室办事员的层次，可以自学电工知识，还借给我一本大学电子技术的教材。拿着郑师傅的书我感到有些茫然。二极管、三极管、电气控制的世界离我太遥远了，电气工程师离我更遥不可及。可是理性又告诉我，有老师近在咫尺，有书在手里，这是我应该珍惜的学习机会。我应该跟着他们学，能走多远走多远。在学习中我可能会找到新的目标。

没有电路电磁场的知识，开始读电子技术的书是很艰涩的，每学懂一点东西时都让我感到很兴奋，学习真是没有止境的。我的业余时间大多在技术科办公室度过，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我成了冬天晚上用湿煤饼最后封火炉的火头军。

技术科的同事们对政工院的人都小心规避。关起门来技术科就是知识的传播地，理性的小世界。外面文化革命的形势不断变化，我们为国家的未来担心，也期盼着文革浩劫的结束。

(五) 7.21师资培训班

1975年“7.21工人大学”在全国范围遍地开花。应形势需要，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7.21工大力学师资培训班”。我们建材厂获得了一个名额。厂里给我报了名。

培训班预计9月初开学，到八月下旬我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工厂让我自己到西安交大查询。就这样我第一次走进了西安交大校园。

西安交大是上海交大55年西迁来的，学校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吸引了无数求学者。校园里一排排规整的苏式教学楼十分气派，林荫道两旁整齐的梧桐树遮天蔽日。肃穆庄严的高等学府给人一种神圣感。我走进基础部大楼，直接走进李文清主任的办公室。

李主任是一位慈祥、敏锐的力学教授，灰白的头发和深色框的眼镜让他更显学者风度。他让我想起了父母和他们燕大的校友们。听完我的来意后李主任不无歉意地告诉我，力学需要很多数理基础知识，为了学生能跟得上教程，他们只收

高中以上学历的学生。而我只有初中学历。

看来我没有达到学校的录取标准，但是不想就此放弃。我问高中学历包括了哪些人群，比如老三届里高三的，老三届高一的，还有文革后上中学的高中生。李主任说这些有高中经历的都可以。我讲如果你们只收老三届高三以上的，我没有可说的，他们完成了正规高中教育。老三届高一的学生比我们没有多学很多知识，我有信心和他们相比。文革后的高中生不会有我基础好。我毕竟在北京最好的中学完成了初中教育，而且工作中没有中断学习。我需要这个进修机会提高自己，工厂也对我有所期待。李主任被我说服了，我被师资培训班录取了。

多年以后李主任对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仍然记忆如新，说对我的勇气、自信和势在必得的决心印象深刻。他后来成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导师和最可信赖的长辈。

开课时间推迟了两个月后我们终于得以进入学校。很快我就感到力学师资班要求高中水平不是没有道理。高等代数、矢量运算、微积分都是力学的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跟上进度不容易。每开始一个新章节，我就要恶补一大堆数学。班里有一些老五届的大学生，他们表现出了实力，可以和老师在课堂上有效互动。大多数学员是文革后失学的各届中学毕业生，程度不齐。但是我们这批年轻人都经过农村和工厂的磨练，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对知识的渴求让我们不敢有些许的松懈。晚上熄灯前宿舍里空空的，大家都到图书馆或教室学习。

在交大学习期间，认识了我后来的先生老蔡。他不是力学班的，是外厂计算机系统研制的技术员。他住的地方离交大不远，每周三晚上会到交大给我辅导数学。当他把复杂的数学公式梳理得简洁明了，让我马上开窍时，我就高兴得不得了。一扇一扇窗户依次打开，力学对我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艰涩诡异。文革中老蔡是大学物理系学生。即便学校停课了，他一直和几个同学坚持学习。坚实的基础让他在工作中颇有成就。

7个月的力学师资培训班顺利结束了，我回到了工厂，除了技术科的日常工作外，在厂里的7.21大学兼任力学课教师。政工组长要调我去做专职教师，甚至让我主管工大工作。常红兵随后表示我可以去工会，在他下面分管工大。我舍不得技术科的环境，也不愿去趟政工院的浑水，就以非党员群众决定不了党的教育路线为由，表示可以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兼职教课，但是不去专职负责工大工作。

政工组随后用女儿的留城问题给技

术科长邹师傅施加压力，让他放我去政工组，邹师傅左右为难。但是没过几天他就高兴地告诉我，女儿留城的问题解决了，他不怕他们了，我不用走了。我最终得以留在邹科长的绿荫庇护之下。

7.21工大是文革中产生的怪胎。正规的大学教育系统被砸烂了，却要各个工厂办工人大学。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有多种方式，没必要非要戴上“大学”的帽子。建材厂工大的学员是各车间推荐的，什么水平的都有。力学课第一节课学生摸底，发现有的老工人不了解小数点是什么。我只好调整了教学内容，从小数点、分数计算和杠杆原理讲起。充其量也就能教到初中物理水平，外加一些力学科普知识。大学是名不副实了，但是能让每个工人有点收获也算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对基础好的学生再多教一些，因材施教。

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西北地区防震，大家都住到地震棚里。我们女单身离开简易宿舍楼，集中住在大会议室里。因为油毡是地震棚的上等建筑材料，建材厂身价陡增。厂里的油毡卖得火爆，车来车往，供不应求，不乏各处来走后门的。

紧接着领袖去世了。在哀乐声中各地加强了警戒战备，民兵每天在工厂持枪站岗巡逻。我由于出身问题没有持枪资格，而一位女工，武装干事的红颜知己，背着长枪昂头挺胸走过来。武装干事的农民老婆自杀或被自杀以后，这位女工抛弃了丈夫孩子，嫁给了又矮又丑的武装干事。

常红兵儿子在外地工作，别人发现常红兵在地震棚里和儿媳有染。这使建材厂的一颗政治明星因为生活绯闻变成了过街老鼠，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我庆幸没有趟政工院的浑水，和这些人为伍。

以四人帮的被捕为标志，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接近了尾声。

77年春季西安交大基础部办了“7.21工大机械设计师资培训班”，我又走进了交大校门。

因为有了力学班的基础，又有工厂描图绘图的经验，跟上学习进度不太困难。77年暑假培训班结业后，李文清主任把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从工厂借调到交大轴承教研室帮助数据处理。可能他对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子女有恻隐之心，希望找机会帮助我们改变各自的人生轨迹。谁也没有提出什么，谁也没有承诺什么，一切机会都要天时地利人和。即便必须回厂工作，我也可以开始介入技术工作或者去搞职工培训。

我和老蔡确立了朋友关系。建立家庭，平安度日，做我喜欢的、力所能及的工作，是在我的年龄段里人的正常诉求。

——待续——

(版权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